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二期 ——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0c)

【旧案新探】	田家英命案探幽(上)	陈小雅
【人物追踪】	我认识这个人——俞强声	周七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旧案新探】

田家英命案探幽(上)

• 陈小雅 •

探究发生在毛泽东周围的命案，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之死。他死前，曾担任毛的秘书长达18年之久。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原名曾正昌。1937年12月到达延安。1948年8月，经陈伯达推荐，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先后掌管毛泽东与亲属的通信、交往，及群众来信；掌管毛泽东的图章、稿费和书籍；参与毛选与毛泽东诗词选集的编辑工作；并直接秉承毛命，参与起草第一部宪法、起草毛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以及从事基层调查研究工作。1966年，中共颁布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七天——5月23日，死于毛泽东的藏书室——中南海永福堂内。终年四十四岁。

◇ 众说纷纭的“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是被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论”。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来源于它的“概观性”。不论这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公私原因，施害者为一场巨大政治阴谋扫清道路，当事人迫于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来临时形成的心理压力，这总是第一原因。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概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事件描述的“模糊性”，并不能满足公众对重建历史原貌的要求，随着文革研究和对毛泽东责任追究的深入，这桩文革“第二大命案”自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事的最近起因，可以追溯到1989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问世。这本书，是由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女儿曾自等主编的一本亲友纪念文集。但据董边在“编后记”中说，由于该文集把田家英的秘书、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传》的主编者之一的逢先知的同名缅怀文章作为首篇、并收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25封信，所以该书被冠以了今名。不论编者这个处理方式的主观动机如何，它在客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的亲密的秘书之死，与毛本人是无关的。

在这本书中，田的亲友们关于田家英的死，是这样叙述的：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1）

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2）

1994年报告文学大家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在写到田家英之死时，虽然有意纠正了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尽可能还原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但在大的结论上，基本沿用了这个观点。

也许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满意，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出一篇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对田家英之死又给出了新的说法：田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

自此，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大致有了三种说法：

- 其一、用绳索上吊自尽；
- 其二、用五四型手枪自杀；
- 其三、被击毙。

而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种说法：

- 其一、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
- 其二、王力、关锋、戚本禹迫害致死；
- 其三、毛泽东、汪东兴谋杀致死。

而所谓“谋杀”论，据说又是以“三个悬疑”为依据的：

- 其一，田家英死后，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定的“验尸”程序？
- 其二，有关田家英问题的档案资料为何失落？
- 其三，与汪东兴一同前往，同田家英谈话的警卫朱国华为何自杀？

据罗冰文章说，这三点悬疑，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年已经作出了关于田家英命案的调查结论之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于1980年4月，根据田的家属来信要求，责成汪东兴交代的。

但是，罗文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1989年由田的亲友、同事编纂的那本纪念文集的结论的支持。而且，2002年12月的《明报》月刊又刊出一篇当事人戚本禹所写《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全面反驳了罗文的要点。不仅如此，还把本案的直接掌控者周恩来和安子文一派人物抖落出来……一时间，这桩本来看似尘埃落定的命案，又陷入众说纷纭之中。

显然，关于本案的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事实的真相、党纪国法、正义与非正义，而且牵扯到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若要蠹清这桩历史旧案，就必须分清事情的层次，才可能有所谓“公允”之论。以下，是脑伤之后的笔者，于阅读之余暇，对事件过程及相关评论所作的一种“梳理”的尝试，在此提出，希望就教于方家。

◇ 田家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综合董边、曾自、叶永烈、戚本禹、王力等人的文章提供的细节，我们大致可以对田家英死亡前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66年5月21日下午二时半，中共中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部主任戚本禹接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安子文说，周恩来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的手稿。之后，三人一同上了安子文的车，直奔田家英住的中南海永福堂。

三人到达田家时，只有田的夫人董边在家。三人略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逢先知回来了。看见这三个人在家，田的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和逢先知坐下之后，对田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从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子文讲完以后，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

安子文回答说：“统统交。”

这时，戚本禹像是在暗示田家英，问道：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是否在他那里？

田家英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戚本禹又问田，毛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回答说，毛的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此时，戚本禹通过田家英处的“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拨通了给汪东兴的电话，告诉他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的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随即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清点工作。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自己应当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田表现出无奈而委屈，但并未多言。下午四时左右，王妙琼到场，同逢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子文与王力先在旁观看。大约五时以后，二人分别乘车返回。戚本禹则回到中央办公厅甲楼向汪东兴通报了情况。戚本禹对汪东兴说，自己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汪东兴说他早有安排。

田家英家吃晚饭时，清点文件的一行人尚未离开田的办公室。他的一双女儿曾通过门缝往里张望，看见桌上、地上到处散落着文件和纸片，田家英站在桌边，紧锁双眉。她们感觉，来人同爸爸说话的语气很强硬。

大约在傍晚六时许，田家英处的文件清点完毕。

晚七时许，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其间，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夜深以后，田家英与戚本禹通了一个电话。戚本禹在那头讲完以后，田家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并满脸怒色地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

又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地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去休息。此后，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

不久，戚本禹带王妙琼再次来到田家英的书房。田家英开始向二人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戚：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戚感到，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

5月23日，清晨5时，董边醒来，发现图书室里的灯仍然亮着，田家英一夜未眠，未吃，依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董边按往常的作息時間，7点照常上班。去单位前，她去找了逢先知。

上午八、九时左右，田家英向他的勤务员陈义国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香烟和其它东西，把陈打发出了门，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

约十时许，勤务员陈义国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将自己反锁在毛泽东藏书室内，叫门不开，绕道窗口，发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上吊死亡了。

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报告。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戚本禹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但董边没能赶来。

来人观察田家英的遗体，舌头外伸，脖子上有绳索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枪伤，在毛泽东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也没有发现手枪和任何血迹。根据现场遗物判断，田家英死前曾喝了一瓶茅台酒，并留下了遗书。

中央来人在观察了现场之后，征得家属同意，决定由中央警卫局派人把田家英遗体送殡仪馆火化。并安排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江青回京后曾大骂汪东兴，责备他们没有早做防备，对田采取监护措施。

关于田家英“遗书”的内容，至今披露于世的是这样一句话：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3〕

◇ 各种陈述的互相矛盾

以上，是笔者根据各种当事人叙述、作家对当事人的采访所获得的细节，根据时间逻辑拼缀而成的整个事件过程。但这个看似平滑的故事，是笔者在拼缀时，舍弃了大量互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说法——进行了“抛光”处理的结果。这些矛盾的几个显著之处如下：

一、时间叙述中的“24小时短缺”

田家英的自杀，与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跟他进行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但关于这场谈话的进行时间，当事人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5月21日和5月22日。

持5月21日说的，是两位谈话的参加者，王力和戚本禹。

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

二十一日或是二十二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这件事的时间，陆定一检讨完后，二十日当天中午就开了常委扩大会，我记得是二十一日到田家的。〔4〕

戚本禹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中，对于他们三人究竟是在何处汇合的，记忆稍有不同，但对于日期的记忆，却是一致的。他说：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

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能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也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5）

但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女儿曾立却记得，谈话时间是5月22日。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采访董边的记录说：

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那是在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

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6）

曾立在《爸爸教育我们的点滴记忆》一文中也说：

那是1966年5月22日爸爸去世前一天的傍晚，吃过晚饭，我和妹妹来到爸爸的书房，刚一推门，就被闻声赶来的妈妈拦住了。妈妈神情严肃，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爸爸这里有事，你们回自己房间去吧。”（7）

王力、戚本禹关于5月21日的记忆均不是以日记为根据的，而是以事件的发生与之以前的重大决定的连续性为根据的。他们的根据是，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陆定一的检查。陆检查以后，当天中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四个人的处理。据王力回忆，就在这一天，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处理四个人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真组由周恩来亲自负责，陆定一组由陈伯达负责，杨尚昆组由康生负责，田家英组由安子文负责。周恩来统一布置，召开会议，布置对四个人谈话，收文件。安子文这个小组的组员是王力和戚本禹。王力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据他的记忆，他们这个分组事后并没有开会。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就在安子文的召集下，去了田家英家里。

据查有关文革“大事记”，陆的检查确系在5月20日（星期五）作的。陆检查之后，是政治局集体对他进行批判。因林彪出示叶群是“处女”的证据，会议开得并不十分严肃。此外，中央关于彭、罗、陆、杨的决定，是在5月23日（星期一、田家英自杀当天）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所以，有关决定的出台，应该在此之前的5月21日（星期六）就已经完成。

持“21日”说的合理性在于，5月21日是星期六，一般星期天是不上班的，如果谈话是在5月22日进行的，这一天是星期天，不仅三人小组是例外的“加班加点”，而且，“当晚”汪东兴召集的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的“罪状”，也是在加班加点的状态下进行的。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共党和国家机关也没有废除这种休息制度，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就已经到了这种“开足马力”的状态，似是不可思议的。另外，读者一定也注意到这个细节：在三人到达时，田不在家，而是和秘书外出。笔者觉得，在一个好不容易到来的休息日，田不太可能会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秘书外出。而且根据田的女儿的回忆，她们平时在学校住校，只有到周末才回到家中。而这一天，放假在家的孩子们，不可能直到黄昏才发现家中的变故。

关于“21日”说，田家英的好友、时任周恩来通讯秘书的梅行《对家英的一点纪念》也可以作为旁证：

（“五一六通知”颁布）过后的第5天，即5月21日，那时还保密不准外传，恰好我在一个开会的宾馆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11点多，准备回家，忽然想起要给家英打个电话。当他

知道我即将回家后，就说要同我见一面。临近 12 点，他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还拿出从宾馆买来的两瓶茅台，很想让他高兴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积郁。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紧张，不想喝酒，很想谈谈当前的形势。当我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后，他开始有点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接着他表示，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他参加革命后 20 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那时的心境已极不平静，当我送他下楼的时候，他还喃喃地讲他并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过了两三天，我同他总是联系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见面后的第 2 天，即 5 月 23 日，竟毫不留恋，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并献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8）

从梅行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在 5 月 21 日是已经知道了关于田案的安排的，所以，他会“忽然想起”要给田打电话，还想对田来一点安慰。虽然，在整段文字中，他也没有说明，他们如何从谈论彭、罗、陆、杨的问题转向了田本人，但他这次择机向田透露一点风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但从田主动要求见梅，以及他们见面时田表现出的“紧张”心情，可以判断，这时——5 月 21 日深夜至 5 月 22 日凌晨——田已经知道了对自己的处理，并且很可能已经与“三人小组”谈过了话。可以想象，为了安慰田，梅行很可能将喝剩的一瓶茅台让田带了回去。而田，正是用这瓶茅台给自己饯行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梅行所说的与田的见面时间，与前述戚本禹夜半会面的时间，已经形成冲突。如果我们相信，田家英没有“分身术”——不可能在已经受到监控的条件下，在同一时间分别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发生在两天的事情。

但是，“21 日说”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于，如果谈话和文件交割是在 21 日进行的，田家英是在 5 月 23 日自杀的，那么，在 5 月 22 日——星期天——的整个白天，在田家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何董边和孩子们竟没有关于这“24 小时”的记忆？从胡乔木到逢先知，乃至叶永烈，为什么都采取了“22 日说”？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人们的记忆出现了一个“24 小时短缺”的故障呢？也许，王力记忆的谈话时间并没有错误，在三人谈话之后，当天的文件并没有交割完毕，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的白天。而三人谈话后，董边作为当事人的妻子，肯定会处在一个心烦意乱的状态下，于是竟发生整整一天的记忆空缺。而戚本禹由于事后坐牢多年，记忆的重构，是依据其它人的回忆建立的，所以，出现了他的时间记忆既与王力的（21 日）说法吻合，又从旁“证明”了董边（22 日）记忆的情况。

二、汪东兴的涉案深浅？

此外，安子文在谈话中是否谈到要田“搬出中南海”？董边经叶永烈的转述是“有”，但王力、戚本禹的记忆均为“没有”。

依笔者之见，安子文既然谈到要田“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他不可能同时又要田搬家；从角色分工来看，此事的确也不归安子文管，而是归汪东兴管。但不知为何原因，中国国内所有回忆与叙述文章，均没有提及汪东兴在本案中的作为，而海外出版物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并进行了“抄家”。请看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

娟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

了。（注：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5月22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受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5月23日清晨自杀。）（9）

这显然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是否恰好透露出一个信息，在那个“逻辑时间”的空缺，恰好是汪东兴光顾田家的时间呢？

再看罗冰对此的说法：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10）

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冰还说：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一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这篇文章虽然对田的死因给出了两种说法，而且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朱国华”，但在汪东兴与田谈话的时间上，却十分的一致。虽然，在罗文指出的时间内，汪东兴也不可能分身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永福堂，但是汪的谈话，而不是安子文一行的谈话，与田的死因关系更密切，却是可以想象的。而且，田在这一天对汪所表示的“气愤”，很可能就是他与梅行所说的内容。晚上已经讲过一遍，白天再讲一遍，思维无须飞跃，语言更加流畅。

目前，我们很难证实，汪东兴是否在最后时刻，与田谈过那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的光顾，肯定谈到了搬家的问题。不然，董边关于“搬家”的伤感记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据王力回忆，当时，汪东兴的确以中南海要修马路为由，统一布置了一批人搬出园外。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涉案人员，但可以肯定，至少也是“失势”的人。他们包括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王稼祥、胡乔木、张际春、张子意、李卓然等。其中胡乔木在搬出中南海以后，在使馆区东郊民巷找到一处不错的独院，虽然离“天子”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可以放下很多的书。

但是，如此一来，如何解释在董边的记忆中，这个搬家的命令，是安子文传达的“印象”呢？笔者认为，董边所说“搬家”之事，很可能是5月21日晚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传达田家英问题会议以后，在董边“失去记忆”的5月22日白天发生的。以后我们还将谈到，作为一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党员，董边对党内历次斗争大概已经有了某种适应性；而作为一个与丈夫感情失和的妻子，此时对丈夫的处境并没有抱以十分的在意，但作为一位天生对于住房问题

具有特别敏感的“孵蛋族”，她很可能将这后一个——令她更刻骨铭心的——记忆，与前一天的消息一并“打包”库存了。

当然，所有国内文章不见提到汪东兴的缘由，很可能与党的《历史决议》有关，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汪东兴的行为，与毛泽东的决定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代毛受过的王力和戚本禹可能倒是看开了，因而，其回忆的可参考性，甚至高于田的亲人或好友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为刘少奇的亲信组织部长，在中央没有对一个干部下结论之前，按照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安子文的谈话只可能限制在停止工作和闭门思过的范围内。但主持过江西苏区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的毛派草寇出身的人整人，自有一套阴狠的不成文的办法。那就是从冷冻、软硬兼施到步步紧逼，最后把人逼到死角的“御人术”。

三、5月22日深夜，谁给谁打了电话？

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董边与戚本禹的说法截然相反。田对董说，5月22日深夜，是戚本禹给他田家英打了电话，事由是要田到办公室对文件清单签字。董边对叶永烈说：

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戚本禹是田家英提拔起来的，算是田的徒弟。以后我们还将谈到，他擅自删去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谈话的内容中，不仅有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内容，还有毛泽东表扬戚本禹的内容。以田的气概，把自己的老师陈伯达都不放在眼里，他当时能如此骂戚，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据李锐透露，早在五十年代后期，田就“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很厌恶。”〔11〕所以，他对江青不满和厌恶，也肯定是存在的。但在文革尚未爆发的情况下，他对江青和戚本禹的关系就作出这种评价，则是不可信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既然早在“逻辑时间”前一天傍晚的“五、六点钟”，他们的文件交割手续已经办完（所谓“手续”，就是双方认定文件交割内容后，签字确认），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戚本禹打这个电话，就显得有些多余了。退一步说，如果田真的尚未签字，按照规定，他是应该补签，而没有理由因戚和江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和戚的个人恩怨，而拒绝签字的。

对于这个与田家英之死至关重要的环节，戚本禹的回忆与上述董边的回忆恰好相反：当晚，他确实与田家英通了电话，但这个电话不是他打给田的，而是田打给他的。戚本禹说：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琮到那里。王妙琮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一九五零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

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的回忆，情节具体，也符合操作规程，并且可以有王妙琮和逢先知作证，不太可能是胡说的。但如果是田家英主动给戚打电话，他为什么又要怒气冲冲地摔电话，而且把人骂了一通呢？这是否田的家人，为强调田与“四人帮及其走狗”的斗争性，在事后编造出来的情节呢？笔者认为，如果田家英给戚本禹“转交遗留”文件不过是个借口，向自己的这个“学徒”试探口风才是真意的话，当他听到这个徒儿一定要公事公办地把王妙琮也一同叫到场——以示他们师徒二人私交已绝——的时候，他不摔电话才怪呢！

笔者认为，董边之所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叙述，并不是她在撒谎，而可能是她当时并不在场，所以，她并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自己的丈夫拨出去的，但在田家英摔电话的当口，她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个情节，并听见了田家英骂人。而当她问田何故发火时，田不便将原委和盘托出，所以编造了一个戚打电话给他的事由……而且，笔者认为，董边在听完田的叙述二十分钟以内，便离开了田家英回到自己的卧室，否则，她不会不知道田、戚通话之后，还发生了戚本禹、王妙琮、逢先知光顾的事情……

在正常情况下，丈夫的这点心思，应该是不会对妻子隐瞒的，但违反纪律的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安全。更何况，在田的命案中，确有许多事情，是不便与妻子分担；有许多信息，是不便与妻子分享的。

不过，笔者认为，戚本禹的上述叙述，恐怕还有一点值得质疑之处。此处暂时按下，待我们讨论“决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后砝码”时再展开。

此外，关于田家英死亡过程的各种叙述中，还存在其他的矛盾之处，譬如：救人者到底是撬门而入，放下尸体？还是跳窗而入，放下尸体？汪东兴既已对田实施了严密“保卫”，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田的死亡？董边为何不愿意最后看一眼丈夫的尸体，并要求验尸？（12）等等。

田家英公案的“关键词”——与毛的向背

根据田家英亲友和同事，以及相关报告文学的记述，田家英命案的性质，首先是一个政治案件。与田家英同为毛的秘书，文革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历史决议》的起草者，文革开始时也被一同赶出中南海的胡乔木，对此过程有一个追述：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家英对吴晗此剧的写作上演完全无关。硬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曾有人说彭是以海瑞自居，而家英坚决反对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现在，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竟在江青的指使下发表在报纸上，家英确实深恶痛绝。196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泽东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13）

这说明，田家英的命案，虽然发生在文革初期，但根子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这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一致的。

那么，田家英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据李锐回忆，主要是田家英与他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三条内容被别人捅了出去：

（家英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人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14）

（庐山会议）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将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15）

李锐的被打入“冷宫”，可能与他身兼毛泽东的通讯秘书，但却依然替自己的“老主人”——陈云说话有关。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和田家英曾向毛建议“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这意味着他对毛的“大跃进”路线及所用一杆人马的不同意见。自然会被毛认为是有“二心”的人。至于田家英，当时，毛泽东的确曾怀疑他与那个本来就子虚乌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联系，还派人查过，因没有实据，所以，针对李锐捅出的事情，毛仅用了一句“挑拨我们与秀才的关系”，“秀才还是我们的人”作了结论。

但是，既然田已经显露出对于毛的极左路线的离心倾向，他的事情绝不会就此了结。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批判“三自一包”政策时，主要批判陈云、邓子恢一派人马的“包产到户”观点。期间，田根据自己前一年在浙江调查的观感，也发表了附和的议论。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的“右倾”，使他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但据胡乔木所说，田的真正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传播中央还未作出结论以前的议论”。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毛泽东说，田家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了。毛泽东的此话，据说还有文字记录。（16）

田家英案中被认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1965年12月发生的所谓“篡改毛泽东语录”事件。

1965年的寒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当整个部署完成后，毛泽东把会议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照例来到杭州越冬。12月21日这一天上午，毛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继续讨论4月底在长沙谈过的“全党学习六本马列经典著作”的问题。毛泽东要求五位秀才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打算连同他自己的一篇在内，共凑六篇。席间，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扯到一个月前（17）《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刚刚（18）发表在《红旗》上的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事后，毛泽东的谈话被要求整理成谈话纪要。当时，关锋和田家英作了笔记，整理的任务也就落到了两个人身上。在田的推辞下，关锋独自一人连夜奋战写出了纪要，并把它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关锋知道后，担心会使田家英带累麻烦，曾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的回答是：“那几句话是谈文艺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19）

另一位当事人胡绳的记忆，与上述经过稍有出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象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4个人在一起，这4个人中“一分为三，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另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5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算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成为家英的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其它原因，家英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压力。（20）

从这个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田家英和胡绳，是主张这个纪要不必包含毛的上述讲话内容的。他们承认主张“删掉”，而且事实上做出来的纪要上，也删掉了这段话。而后来人们所谓田家英在这件事情上受人“陷害”的问题，实际上是关锋整理出的初稿上原本有没有毛的这段讲话的问题；是田家英亲手删去了这段话，还是关锋根据胡田二人意见整理时就没有这句话的问题。

这件事，大概是经由江青，被报告了毛泽东。在田的案卷中，确有一份“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有关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但具体是陈伯达发现纪要有“缺漏”，追查过后把事情捅给了江青？还是关锋向陈伯达、江青报告后，二人商量的应对措施？目前还无法知晓。这大概就是国内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认田是被陈伯达、江青，或者王、关、戚“陷害”或“迫害”致死的原因。

其实，能致田家英于死地的，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真像人们所说，是“兴之所至”的“闲聊篇”，那田家英必不会因此罹祸。但“举重若轻”恰好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他这样做的意图，一是可以探测周围人的反应，如果阻力很大，他可以暂时搁置，或迂回进行；二是可以借此发现，谁是他未来重大战略部署中隐藏的“敌人”。

因此，田家英的被“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关于他的政治指控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与当时已经被批斗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不正常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很难确知当年对田的这一指控，究竟所指何事？流行的看法是，毛的这一猜忌并没有多少理由，只因为他要搬掉田，就利用了二人“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何况，田1961年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是由杨尚昆提议的。（21）但有人说，杨曾在田的私生活问题上“包庇”过他。

◇ 田案与杨案的关系

在尚未接触到杨、田之间更深一层关系之前，一个偶然的机，笔者了解到，杨尚昆和田家英，至少在私人关系上是不错的。

事情起始于笔者阅读《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时，对于刘少奇与陈伯达关系的一个提问：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过的旧房子陈伯达可以住。以此证明，陈与刘的关系非同一般。但了解的结果是，陈伯达其实并没有住进这所房子，原因是当时的中办主管杨尚昆对他说：“这个房子你不能住。”后来的结果，是杨自己住了进去。（22）凑巧，后来笔者在李锐《怀念田家英》一文中看到，50年代，田也曾与他谈到，陈伯达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帐”。（23）但不知道田此处所说，与上述刘少奇旧宅的安排是否同一件事？如果是，可见田对杨的好感，足以使他持有待人论事的“双重标准”；如果不是，则足见陈在处理个人事务方面的窝囊。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一件令田感到“快意”的事情，不排除是杨尚昆替他“出气”之事！

此外，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李锐的文章还透露出，田曾私下与他议论过毛与周围服务人员的关系。那么，田又如何能知道这些内情呢？熟悉田家英史料的人都知道，田的一个重要职务，就是毛泽东稿费的主管。这个职务，在通常情况下，本是毛的“内掌柜”——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毛的“生活秘书”江青的份内事。但是，因为毛经常需要用这笔钱去安顿自己的女友，所以，他不可能让妻子江青去管这笔钱，而是委托与自己有同好的田去发放……从田“平反”后杨尚昆的回忆中，我们则可以了解到，毛的这笔钱，是存放在一个专门管理庄严的党产的、叫做“特别会计室”的地方。这个会计室分为两个部分，由不同的人主管两笔帐。第一部分管理遗留的党产和党员上交的党费；另一部分“代管”毛的稿费。

关于这笔稿费的支取手续，杨尚昆说：

“他（毛泽东）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它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24）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知，杨尚昆和田家英无可避免地处于毛的私生活秘闻世界的“共享”者地位。而历史的“巧合”在于，1961年毛泽东专列“窃听器”事件爆发后，毛的机要秘书及“涉案”十七人受到处分和牵连，而正是通过这个事件，田被作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由杨尚昆推荐接替了原来掌管机要的叶子龙的地位。这件事给毛带来的“不安全感”，足以使他周围的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据戚本禹回忆，在中共中央处理田家英专案小组成立之前，其实，公安部已经介入了田案。在1966年5月21日晚中央办公厅的传达会议中，更是揭发出许多他“闻所未闻”的事情。请看戚本禹是怎么说的：

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有关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主席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

（21日晚）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

田家英X X X X X的夫人X X X，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25）

关于这次传达与众人的批判“火力”，王力的回忆也有所透露：

安子文没有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据我所知，是汪东兴统一布置叫一批人搬出中南海，……我当时听说中办的一些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不象安子文说的那么缓和，甚至说采取了相当粗暴的批斗式的态度。不只是汪东兴一个人，还有些相当粗暴的人，当时是有相当的压力。因为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把田家英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田家英的一个哥哥在香港。（26）

毛把田的问题看作“敌我矛盾”，恐怕并不依赖于当时已不在“枕边”的江青吹风，而是由于另一件事情的曝光。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中，谈到田家英的婚姻状况时，第一次向公众透露出，田、董结合时，田的婚姻是“在婚”状态。田的前妻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二人因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缔结了感情，一齐私奔了延安，后在延安马列学院正式结婚。但是，据叶永烈说，“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但知情人说，刘与田只是暂时分居。分居的原因，是刘已经怀孕，准备生产。在那个艰苦而匮乏的时代，妻子怀孕或生产，如果得不到丈夫的照拂与谅解，已经解放了的女性大体都会像贺子珍那样，选择分居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大概就是叶永烈所谓“感情裂痕”的由来。但是，他们并未正式离婚。所以，在刘得知田董结合以后，曾以“重婚罪”将事情告到了杨尚昆那里，希望组织能够为她“作主”。不过，这一次，杨并没有像照顾李锐那样，还夫于妻，甚至没有给刘成智一个“说法”，而是将此事掩盖了过去。在这位权势者的庇护下，女方只得忍气吞声。但到文革前夕，“窃听器”事发东窗，杨尚昆被“双规”以后，这个问题被再次揭发了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的存在，才会出现如叶永烈所说，董、田结合时有一个体现了“女权”的“约法三章”：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

第二，两个人的事，由女方作主。

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27）

在董边以后，尽管田又有过N个女友，并怀有子嗣（其中一个儿子，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于田家英平反前夕自杀），但田毕竟遵守了与董边的“约法”。

对于这些事情，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所以，他也曾以婉转的形式，对田进行过“敲打”：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泽东特地嘱咐他要带上董边。田家英则回答说：“我带不动她。”（28）

毛之所以能够长期容忍田在自己的身边，从帝王的“御臣术”来看，有两种便利，其一，他有心把田作为一个“右派秘书”予以保留，通过他，可以掌握党内外“右派”势力的思想与动向；其二，身上有些小缺点的人，容易控制。在女人问题上，毛泽东与田也算“同病相怜”，故而能够惺惺相惜。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尚且不是“清教徒”，更何况他的臣下呢？

但是，毛能“包容”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包庇”这个人。他的包容，是“施恩”，但杨尚昆包庇，就可能被视为“结党营私”。正是这件事情的揭发，使毛泽东把杨、田的私人关系，与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毛泽东权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联系起来。正如他会把田对陈云经济思想的赞同，联想为“对另一个主席的忠诚”（29）一样，毛泽东最怕的就是党内高层的人，尤其是军人与政治家的“结盟”，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结盟。他更害怕这些人与他身边的人“结盟”。从子虚乌有的“高饶联盟”、“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到所谓“刘少奇司令部”与“林陈反党集团”等等的指控，在在反应出毛的这一心病。

在这种格局和心态中，毛反观自己的心腹田家英，无异是一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 “玩物”上瘾，惹祸侵身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在“五一六”通知之前，在中共“三人小组”之外，公安部为田家英立有“特殊问题”的专案内容是什么？但是，可以参照的是，这个“百忙”的专政部门曾因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与一位收藏家的私人文物交易，立有一个的专案，并发过内部通报。而邓拓与田家英一样，都是在文革爆发时率先采取了“以死抗争”的抉择——在“五一六通知”颁发后的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比田只早走了六天。（30）此事使笔者产生了一个联想，公安部为田所立之“案”，是否也与田的文物敛藏癖有关呢？

爱“字”，是田家英的公然嗜好。他曾以“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自况。但是，田的“爱字”并不是爱写字、爱与人切磋书法，或者热心于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制定。据说，田的字写得并不算好，但他却爱收藏书法作品，尤其是有目标的收藏国家文物部门尚无精力和财力顾及的清代人的书法，以及就近收集毛泽东的字迹。据逢先知称，田曾将凡是能到手的每一张毛的字迹，都“精工装裱”，平日秘不示人，只有亲朋好友来了，才与之分享。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毛的这些字迹（手稿），在“三人谈话”前，田已上交中央档案馆，所以，它肯定与在此之前已经成立的公安部的“专案”有关。这笔帐由于清偿得较早，也较为迅速，其中究竟有多少“宝贝”？外界很难得知。而另一笔——因田家英的死亡被抄没的财富，直到田家英平反后全部发还给他的家人，才得以见天日。

那么，这究竟是一笔怎样的财富呢？据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说，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光是书籍字画就有一卡车。其中文物字画有“一千几百件”。这些“劫后余生”的藏品，曾令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都感到汗颜。他说：

“过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迹，只当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知其名，未见其字，这

次从家英藏品中大饱了眼福。过去国家博物馆征集文物，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年代久远的文物，对离现在较近的清代的東西重视不够，现在，要想再收集这样系统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作法早了我们整整30年。”（31）

田家英的诗文旧友梅行在悼念田的文章中也说，家英收藏的“规模之大，用心之深”，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些藏品，是田家英在中共建国后，到他去世前的十六年时间里搜集的，比起那些世代书香、历朝贵胄、文苑宿友来说，他既没有家藏的历史，也没有文化的传承背景，更没有“玩家”雄厚的经济资源，田家英究竟花了多大的心力来搜集这批文物，今天的我们已很难窥其全豹了。但从田的同事、朋友有限的回忆文字来看，他搜求文物字画的足迹，的确是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镇北京、上海和杭州。那里的古旧书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都是其稔熟之地。由于他身据“毛泽东秘书”的要职，又十分注意结交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并将自己的嗜好、索求之物事先公告于人，地方上凡有动静，就会有人与之通风报信。据曾自说，北京琉璃厂松古堂老板就“经常帮父亲选购一些好书，有时还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

上海市文管会负责人方行在《书海文苑一知音》中，就这样记叙了他与田的交往：

我和家英同志初次见面，是在上海天平路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内。那次，他因公来沪，顺便到文管会鉴赏所藏的明清人书法，时间大概是1958或1959年。此后我们就常相往还。……

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有时去各省市进行调查，在繁忙之余……搜集了大量清代学者和近代革命家的书法以及信札之类。他有感于某些文物单位，以为清人去今未远，不很介意，即使留意的也只限于著名书家的作品；对并非以书法著称的清代学者的墨迹，往往漠视。他却认为这是研究清代学术史所不可或缺的，如不及时收集，就有被湮没的危险。他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总是利用闲隙随时收集。

上海朵云轩，是家英同志每次来沪时常去的地方，我曾多次与他同往。他和该店的同志很熟悉，不仅提供他看在门市部尚未摆出来的东西，还陪他到仓库去拣选。从堆满架上的卷轴，乃至尘封的残帙，他无不看个明白，常常弄得满身灰尘，两手墨黑，他仍怡然自得，若是有所发现，更喜不自胜，连连称道：“不虚此行”，“不虚此行”。（32）

杭州的史莽在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他与田的这类交往：

我认识家英大约是1963年，刚从诸暨枫桥搞社教回来。一天晚上，林乎加（33）同志派人来邀我去玩。到了西泠宾馆，只见林乎加同志与一位年纪和我相仿、满口四川话的同志在交谈，一介绍，才知道这位四川同志，就是久闻其名的田家英……

……谈起“西泠八家”，家英忽然遗憾地说，八家中七家的字我都有，独缺最重要的一家——丁敬。我告诉他，丁敬的字在杭州比较容易买到，因为丁是杭州人。他就托我为他觅一张。我答应到杭州书画社去看看。家英于是问我是否收藏字画，我告诉他，我不收藏字画，只买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古籍和古代工艺品……

过了几天，征得杭州市文化局负责同志的同意，杭州书画社把两张内柜出售的丁敬的字送去让家英选购。一张是丁敬送人的立轴，写得端正，裱得讲究。另一张是丁敬的《豆腐诗》草稿，写得随便，印章也是后人补盖的；但是内容好，字也天趣盎然。家英一时决定不下来，又

邀我去帮他下决心。我力主买《豆腐诗》。他同意了，花了60块钱。“诗、字都好，就是价格太贵了。”记得买下后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因我总感到靠工资过活的我辈花这么多钱买一张字，有些犯不着，虽然我有时也做类似的傻事。家英察觉到我在顾虑他的经济负担，就解释说：“我没有什么嗜好，一个月的工资省出一点钱来买一、二张字，还是负担得了的。”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有些不安，因为此事是我促成的。

记不得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家英忽然来我家辞行，告诉我第二天就要返北京了。他的来访，说实话，很出我的意外。这使我看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平等待人，看重同志之间的情谊。那天晚上我们谈得比较多。他告诉我，他专门收藏清朝人的字，现在已近千件，十几年的工资，除了衣食以外，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为什么要孜孜不倦于此呢？记得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欣赏祖国的这门古老艺术——书法。二是收集近三百年来的史料，如他曾收集到龚自珍的诗文、鲁迅的书信、李大钊的文稿等。三是“人舍我取”一般人多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有散失和泯灭的危险。

家英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深有同感。我告诉他，为了收集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用的古籍和实物资料，我也省衣节食，耗尽了十几年微薄的工资，有时甚至断炊、负债，做“举鼎绝膑”的蠢事，被人当作傻瓜看待……

家英最后一次随毛主席来杭是1965年冬。……（34）

从史莽的这段记叙，我们看出了他的不安，而且自责。这也是所有曾经同情和关心过田家英命运人士的不安，那就是，一个靠工资为生的人，家有儿女，他真有那么多的钱来“玩”文物吗？有人替他算过一笔帐，即使他有条件把价格压得很低，但在十二年内（从1953年实行工资制开始算起），要购得一千五百多件文物，平均每年也得购个一百多件，平均每月得购个十多件（而不是像田对史莽所说“一、两件”）。据载，1952年议定工资级别时，田家英的级别定为十级，每月工资约有二百来元，后来，毛泽东带头为自己降低三级工资，全党追随学习，高级干部纷纷自减一级到两级不等，相信毛身边的田家英也不会落人之后，这样，即使他以每件文物十元的平均价格购入的话，也要花上他工资的一大半。如果排除六十年代“三年饥荒”的物价因素，以及在买字之外还要买书、抽烟、喝酒，还要请客吃饭等因素，田的支付能力，的确是很令人生疑的……

于是，便有人提出，这位田哥儿是否在监管毛泽东稿费的时候，有过“挪用”的问题？后来人也注意到，在叶永烈所讲述的田家英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些看来有趣的情节：

有时候，田家英手头也有钱，显得很“阔气”——那钱是毛泽东给的，他替毛泽东到书店里大批大批地买书。（35）

毛泽东的书房里，忽地挂起了一幅清朝书画家郑板桥（郑燮）的手迹。郑板桥乃“扬州八怪”之一，草书劲峭，体貌疏朗，自成一格。

在抽烟、喝茶的片刻，毛泽东踱了过去，歪着脑袋，细细欣赏着郑板桥那竖长撇法运笔，有时甚至用手指头在掌心比划起来。

毛泽东喜欢书法。他的字，潇洒豪放，无拘无束，如天马行空，似蛟龙过海。闲暇时，端详百家书法，是他的嗜好。

那幅郑板桥的草书挂了几天，忽地不见了，却出现在田家英家中。

过了些日子，又一幅清朝书法家的手迹，出现在毛泽东书房。

几天之后，却又出现在田家英家中……（36）

这件事的确有些令人纳闷：究竟是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买了这些字画，自己挂了一段，就命田家英收起来（田于是借去挂几天）？还是田家英自己买了这些字画，出于对毛的爱戴，先送毛欣赏呢？或者是精明的他，在资金周转不开时，先放在毛那里挂着，等到自己补上了漏洞后，再收归己有？

而史莽的“不安”和自责，是否因为这位田哥儿曾不经意地向他透露过，毛的稿费可以为他济急？而过后，自知失言的他，马上又谈到“工资”云云？由于中国文化有“为尊者讳”和“为贤者讳”的传统，我们只能从作者字里行间的情感去揣测了……

叶永烈文中所说的那幅“清朝书法家手迹”，可能就是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别号“完白山人”的邓石如的一副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副对联给田家英生前带来纷扰，至今未息。据田的二女婿陈烈说，这副字的来历这样的：

田曾多次随毛到杭州小住，1961年，他又奉毛命到杭州搞“农村调查”，大概是由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拮据，不少人把祖传的文物也拿出去卖了。所以，过去只能从画册上看到照片的文物，这个时期却可以在市面上见到了。也就是在此时，田家英“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这副对联，立即买了下来。据梅行、范用说，田回京后即把此物“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碍难割舍，“借”去挂了很长一段时间。（37）陈伯达就是在毛处看到这副联，以后又发现此联出现在田的家中，才对田家英收藏中是否有“猫儿匿”提出疑问的。

笔者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对这个故事也曾进行过援引，并认为，田肯定是以少于丁敬的那幅《豆腐诗》的价钱买下这副联的，不然，他的家属不会独独记得那一幅字的“昂贵”。并且，我认为，如果田用毛的稿费为自己买几幅字，即使未经毛的同意（说不定毛还真的同意），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田为毛著、毛诗注解所花的心力，足可以使他认为，毛的稿费中也有他的血汗结晶。毛的稿费来自于全国党员的党费，要说拿在手里应该有些不安心的，应该是毛，而不是田。

但是，最近有几篇网上文章，足以颠覆笔者的上述成见。其中《给董边和田家英后人的一封信公开呼吁信》中指称，田手中的这副对联，根本就是“借”去的！但在1964年出版的《邓石如书法选集》中，这幅字却盖上了田的图章。写信人呼吁田家后人，还是将此件物归原主——交西泠印社收藏为好。

网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为核实这一事情经过，我耐心等待了两个月，直到亲自读到呼吁信所引以为据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旧事拾遗》（38），打开一看，第95—97页果然有这样一段叙述：

西泠印社接受捐献问题，这事的开始是1959年印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办展览会向上海借展品时，王树勋主任和我去张鲁安家问哪家有东西，张鲁安谈到印社30周年纪念会时陈列过一件“邓王”，说你们要吗？王树勋同志问我：“什么叫邓王”？我说：“是皖派‘篆刻的创始者邓石如的书法中艺术性最高的一副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王主任说：“好嘛。”张鲁安说去联系联系看……第二次到上海去时，张鲁安说你们下次来可去拿了，藏者是魏廷荣，已答应捐献了，不受奖的。……我们送了魏廷荣一封感谢信和印章印泥。这副对联的确是精品，

是国内闻名的，立即带回杭州交书画社保管。过了两天我到书画社去，看见有几位同志情况很紧张，女营业员林桂芬（后调上海去了）在哭，怪了！王主任告诉我：“上海拿回来的那副对联，林桂芬借出去，一同借出去的书法只还来两副，邓石如一联未还来，去大华饭店讨了三次讨不回来，一直惊动了市政府，也讨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来的东西，首长爱它，总是说明这是件好东西了。”我记得那天傍晚，王主任问我意见怎样，我说：首长定要拿去欣赏，取不回来，能有什么办法？我就建议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今后吸收捐献之件。这是西泠印社解放后接受捐献的第一件作品，自此开始以西泠印社名义接受捐献之件。（65年有人告诉我，此联已在近年出版的邓石如作品选集》印出来了，我未见过这本书）从这件事后，就接受了教训，派专人保管捐献物品，并建立了管理制度。每一个捐献者专设一张一卡片，记上时间数量，就是怕再借不还。

书中还附上了邓石如这幅名联的照片，它虽然没有点明那位“首长”的姓名，但从各种回忆材料所属时间地点情节来看，这应该就是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的那幅邓石如联了。

不过，笔者认为，单凭这段回忆，尚不足以说明质疑田据有此联的合法性，因为它没有说明西泠印社是否拥有田家英的亲笔借据，也没有说明田在事后（特别是如果公安局曾为此立案的话）是否补办了购买的手续。在笔者接触的田家英掌故中，确有一起涉及“有借无还”的事例，它来自于胡绳先生的回忆：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6年3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他把这卷条幅拿去，要和他所有的同一个人写的字卷对照一下。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39）

田去世后，他的全部收藏被没收，这幅明人条幅，自然也就没有了物归原主的机会。胡绳对此事的难以忘怀，当然并不是因为对这件物品的留恋，而是对田在那种“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刻，仍如此沉迷于“字”的爱好，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

不过，笔者认为，邓石如的这件作品，既然在1964年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被收入，说明西泠印社在田去世前，还是有机会索回它的。之所以没有索回，恐怕在手续上是做了弥补的。

在这个问题上，方行的另一段回忆也可以作为参照：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李大钊同志手抄的《素书》，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具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40）

此处所说高履芳，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夫人，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她的专驾莅临，恐怕与动员田家英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收藏家提供藏品的“礼节”不无关系。按照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上、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归个人所有；国家根据财力情况划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物由国家收购或收藏，凡国家所有但决定暂不收藏的，必须

在写出有关研究报告或出版以后，方能上市流通。方行所说的李大钊真迹，可能就属于国家决定暂不收藏，但仍未写出研究报告或出版的文物，所以，尽管这件藏品已有过户手续，但在国家法律的意义上，手续仍不能算完全。如国家文物出版部门决定出版，作为收藏者，田家英是有义务提供帮助的。在国家无力组织研究或暂无出版意愿的情况下，私人购买这些文物，往往要以“打算研究”为条件，方能被准许。这就是田家英自己、他的家属、朋友和同事都一再强调，田是为“研究”而收藏，而不是为“聚财”而收藏的原因所在。这样，不但收藏者可以免责，介绍人也无过。

上文谈到，方行和高履芳一行既然看到了田的清代书法藏品，想必也是看到了邓石如的对联的。而此后，这副对联能为文物出版社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收入其中，相信是后来持续动员的结果。而在田家英一方，敢于将这幅盖上了自己图章的“爱字”交与出版社拍摄制作，相信手续应该是完备的。

综观以上情况，田家英玩字虽说还没有到“玩命”的程度，但已经有几分走火入魔了。作为一个身处危境，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他的确缺少应有的谨慎。但要说他会有意识地倚官仗势、巧取豪夺，以非法手段搜敛民间和国家财富，以至于需要“专政机关”介入，这既不可思议，也是不正常的。这大概也是文革中不少群众要求“砸烂公检法”，外语学院红卫兵到公安部抢档案的原因之一。

◇ 来自后宫的猜忌——与江青的矛盾

如前所述，田家英曾埋怨毛泽东：“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叶永烈已经一语道破，所谓“左右”者，就是毛泽东的近臣和“身边的人”，实指陈伯达、江青之流也。

田家英对江青的不满，早在50年代就有所流露。原因大概起于江青曾把田的卧房称为“狗窝”。据逢先知说：

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趋炎附势，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态度，他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会对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关锋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划下，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41）

不过，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江田矛盾，应该还有更悠远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田所管辖的许多毛泽东的事务，与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设职原意，的确可能会发生摩擦。譬如毛泽东的稿费管理，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家庭中，当妻子的都会认为，那应该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又如毛泽东交女友，中央任命江青当生活秘书，不排除是对毛的“性自由”的一种约束，但田的介入，难免会伤害一个合法的妻子的感情。

另外，田曾经当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语文老师。而据叶永烈描述，这对年龄相仿的“师徒”关系不错：

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

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42）

而这对师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看不惯江青。据说，这位与“母后”接触并不多的“太子”，曾出言尖锐地斥责江青：

“如果你不喜欢爸爸，你就走开！”

在专制制度下，东宫与皇上近臣的这种关系，对于后宫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于以上种种，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他之所以要这样刻意安排，除了给自己提供便利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考虑，那就是“利用矛盾，互相制衡”。中国古代“帝王术”的一条箴言便是：只有当人人都感到不安全的时候，皇帝才是安全的。而当人人自危，人人都需要通过竞相表示对皇帝的忠诚来稳固自身和压倒对手时，帝王就可以利用他们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所以，这正是毛泽东“高明”的“治左右”之术。淳朴的田家英看不透毛泽东的本质，他也无法接受，自己不能获得毛的全部信任和专宠是一个实事，而把仇恨集中在毛的“左右”身上，是他的终身悲剧。

从现有资料看，江青十分强调田有香港的社会关系，并刻意要把田的问题上升到“敌我关系”的高度来对待，除了田与五十年代后期依靠左的理论和文艺批评凝聚上升的“上海帮”核心文人集团的天然对立情势之外，恐怕还有江青本人的一个旧病，那就是自他与毛泽东恋爱以来，一直围绕着她从未散去的绯闻袭击阴影。笔者在《中国“丈夫”》一书中已经描述过，自1939年以来六次袭击的状况，其中有几次，都与国统区媒体或香港媒体有关。（43）最奇特的一次发生在1959年，其真相至今尚未了然。案情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

1959年3月，江青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下榻的地点，是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主任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陡变……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看后，认为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立即找来了罗瑞卿，命公安部火速侦查。于是，由公安部两名侦查专家与上海市公安局十八名资深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随即展开了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专案组无法通过信的内容寻找线索，于是只好从信封查起。

根据邮递员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查到了嫌疑人钟某某。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此人作案的可能。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与田家英等人一行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就送来了，其中又有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信封上也是那五个字：“江青同志收”。按照相关线索，专案组再一次将疑点集中到一个姓曾的人身上。不过，此人立即被罗瑞卿排除了，理由是曾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于是，专案组只好另辟蹊径，从打字机鉴定入手。正当专案组准备拘捕一个汤姓妇女的方案时，汤突然“精神病复发”，砸坏了包括打字机在内的办公用具，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不久，又在“企图逃出医院”时突遭车祸身亡！而对汤使用过的打字机鉴定的结果却是，它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一台！

最后，江青终于提供了信件正本，顺着匿名信纸张这条线索，专案组终于找到了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金被捕后，爽快地供述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对他判处了三年徒刑。（44）

至于这名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是从何处得知江青的历史？又是如何得知此时中共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最重要的是，他如何知道在这期间江青所住的地址？以及江的行程表和毛的到达时间的？他与那位碰不得的姓曾的（田家英本姓曾）“秘密党员”是什么关系？此事虽然已经“结案”，但在江青那里，其实是一件“了尤未了”的事情。大概由于这些缘故，神经本来就不太正常的江，很可能把一切对之不友善的人，尤其是毛身边的人，都看作埋藏在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奸细了。

（未完待续）

~~~~~

### 【人物追踪】

我认识这个人——俞强声

• 周七月 •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

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1968年6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44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

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1969年5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解放初期自杀了。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1976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获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获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到1978年5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

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